

哪里脏了，哪里有水渍，微信群里就会被马上公开提醒。处理速度要快，因为他们很怕被投诉。另一点，社会对洁净的要求几乎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。比如，洗手台不能有任何水滴，地板上不能有湿的印子，公共区域不能有任何垃圾，而要做到这些，就需要保洁员随时随地处在一个“永动机”状态，休息自然成了奢望。

保洁的工作需要“隐身”，人们不需要看到保洁员是怎么工作的，只需要进来是干净的；但保安需要大庭广众之下去做，比如车辆指引、登记、巡逻等，虽然算有固定休息室，但工作依然被高度监控。网约车和外卖小哥在户外移动，他们可能自由度相对较高，但生活不规律。

我认为，保洁员基本权利的根本不在于需要一个“休息室”，而是要有正当休息的权利以及提高单位时间薪水。这样的呼吁，有可能更具体地改善一群人的生活处境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生存面前，人的尊严和权利很多情况下是被后置的。对此你保持乐观还是悲观？目前你关注到的解决方案或措施，能一定程度改善现状吗？

张小满：保洁员的话题，是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又被重新讨论起来的。关于基层劳动者的尊严喊了几十年，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能让保洁员的处境被大家看

右图：深圳一超级商场内，保洁员开着扫地车清扫地面，经过巨幅广告牌。

摄影 / 饼干



到，了解真实的世界如何运作，但解决问题不是一本书能做到的。

最近我看到上海由总工会牵头做的措施，很有成效。在城市里生活，大家很少能“向下看”。或者说在家庭生活里也一样，有时你会不自觉在剥削别人的劳动、无视别人的劳动。有时你看不到保洁、保安、菜贩、快递员，有时你也看不到你的配偶、同事、子女。我想，君子检身，常若有过，要常觉有愧，要看到别人，或许也能因此，让自己成为更完整的人。

当一家公司连工人的工资都很难发出时，你也很难说让它去兼顾每个员工。这点上，我内心是很悲观的，但仍要在悲观中保持乐观，要相信“保洁员应该有一间休息室”的权利争取是正当的，且应该被实现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保洁员群体的故事，本质上也映照着我们很多人未来的处境，对于中老年或者未来的中老年就业和职场问题，你是否也有过思考？

张小满：表面上看是中老年的就业问题，实际上是更大的养老问题。比如，我的父亲年轻时在建筑工地上打工，现在65岁了，从60岁他开始领养老金，每个月几百块，非常少。即便自己的儿女再能挣钱，他们也不想用儿女的钱。他们觉得只要有手有脚，能挣钱，得到基本尊重就可以了。

母亲一辈子都是体力劳动的蓝领，而我看似是跃入“体面阶层”的白领，母亲向来以此为荣。但后来，随着记录故事的推进，我得以重新回望、珍重自己的来处，也越来越感到，自己很多看似努力的行为，看似接触到的圈子，其实不堪一击。■